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三編 9

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五個面向：
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
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

簡素琇·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三 編

第 9 冊

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五個面向：
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

簡素琿 著

1622009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五個面向：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簡素琿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52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三編；第9冊)

ISBN：978-986-322-471-6 (精裝)

1. 啓蒙思想 2. 日據時期

733.08

102017306

ISBN-978-986-322-471-6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三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322-471-6

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五個面向：
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

作 者 簡素琿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18 冊 (精裝) 新臺幣 4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五個面向：
臺灣殖民地現代性的建立與張深切思想的指標性意義

簡素琿 著

作者簡介

簡素琿（1958～），宜蘭羅東人。1973年就讀臺北第一女中（～1976）。1976年就讀臺師大英語系（～1980）。1982年就讀輔仁大學英文研究所（～1985），主修現代英美文學詩歌。1995年就讀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班（～2007），主修臺灣文學。歷任臺北市立蘭雅國中英文教師、臺中嶺東商專（現嶺東科技大學）專任英文講師、靜宜大學英文系專任英文講師、明志工專（現明志科技大學）專任英文講師。現在為臺北市立明倫高中英文教師（1994～迄今），並教授臺灣新文學選修課程、創作新詩與寫作詩評。

提 要

本論文以文化啟蒙與現代性的觀點，分析張深切與其他日治時期臺灣啟蒙者的各個思想面向：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理性宗教觀、文化哲學觀等，目的既是為張深切找尋在此啟蒙運動中的位置與意義，也在研究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特色，對照其與明治啟蒙與五四啟蒙思想間的淵源與異同、並從其與世界文化哲學接軌的角度，重新評價此啟蒙運動所建構出的新文化思想的現代性意義，期使這段臺灣歷史，不致陷入歷史迷霧、虛無主義或破碎曖昧多義的解讀之中。本論文廣泛收集日治時期的各種出版品：官方與半官方出版品；《臺灣民報》、《臺灣大眾時報》、《臺灣文藝》、《臺灣文藝叢誌》、《崇文社文集百期彙刊》等日治時期啟蒙者所創辦的報刊雜誌；左右派啟蒙者與傳統文人的日記、自傳、傳記、詩集、小說、文集、學術論文等；張深切的所有著作等等，做為進入歷史脈絡、耙梳史料的依據，以期讓史料自己呈現出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特色與張深切思想的現代性意義。



目次

緒論	日治時期台灣的啟蒙運動與張深切的啟蒙思想：被殖民啟蒙、現代性與歷史書寫……	1
第一節	分裂與統合：191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中期台灣啟蒙運動的多向碎裂性 vs. 同質共相性……	3
第二節	被殖民情境下的啟蒙現代性：「歐洲中心」文化模式，還是「文化主體」的建構……	5
第三節	在後現代文化思潮裡，對日治時期台灣啟蒙運動理性精神的省思……	7
第四節	歷史書寫：在思想史、歷史語境的重建、「大敘述」與理論之間……	9
第一章	啟蒙思想的翻譯：十九世紀以來中、日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啟蒙運動與張深切的啟蒙思想……	15
前言		15
第一節	日治時期台灣前現代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與啟蒙運動的關聯……	20
第二節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啟蒙運動始末：做為社會政治運動先鋒的啟蒙運動……	25

第三節	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啓蒙運動的中、日淵源	28
第四節	1920年代啓蒙運動的左右分流與1930年代的整合：政治狂熱的20年代與回歸文化啓蒙運動本位的30年代	31
第五節	日人主導下的日治時期出版品：從殖民者觀點所建立的世界觀與現代化	39
第六節	台灣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內容與對西方、日本與中國啓蒙思想的引介：以1920年代《台灣民報》爲研究	42
第七節	被殖民地啓蒙思想主體性的建立——擬仿與挪用	54
第八節	張深切的啓蒙思想與其在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的定位	56
第二章	啓蒙與民族主義之間：從張深切包含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透視日治時期啓蒙者的民族主義內容與認同觀	61
第一節	張深切民族思想的萌芽與成長期（1917～1923）	63
第二節	張深切受第三共產國際影響下的民族主義時期（1924～1933）	66
第三節	張深切民族思想的成熟期（1934～1965）：張深切自由思想文化民族主義所包含的啓蒙思想特徵與世界主義	68
第四節	張深切對民族建構性的認知與皇民化時期台灣啓蒙者對民族建構性的體認與國族認同	73
第五節	啓蒙理性與民族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之間：張深切與日治時期啓蒙者包含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主張、其國族認同及亞洲民族主義	76
第六節	結語：張深切的自由思想文化民族主義與他的時代	83
第三章	張深切的自由思想與臺灣日治時期自由主義	87

第一節	日治時期對自由主義初期的接觸：梁啓超、板垣退助、吉野作造、永井柳太郎、島田三郎等	91
第二節	日治時期啓蒙者在《台灣民報》對自由主義思想的翻譯與引介評論	95
第三節	張深切的自由思想與日治時期自由主義的淵源	103
第四節	結語：張深切「自由人」的形象與對自由主義精神的體現	107
第四章	日治時期台灣社會主義思想的流行與張深切的「道德文學」主張：從馬克思通向老莊	115
第一節	從西方社會主義到日治時期社會主義的流行與張深切	115
第二節	台灣 1920 年代中期至 1930 年代初期，左翼社會政治運動概況及各流派間的理念差異與衝突鬥爭	119
第三節	1920 年代台灣社會主義思想的引介與傳播：以《台灣民報》為研究	122
第四節	做為無產階級革命先鋒的《台灣大眾時報》	131
第五節	張深切與日治時期啓蒙左翼的關聯與廣東台灣獨立革命時期（1926~7）	133
第六節	張深切融合科學主義、辯證法、唯物史觀與老子思想的「道德文學」主張	137
第七節	結語：張深切的創見——從新馬克思主義看張深切的「道德文學」主張	145
第五章	理性時代的宗教觀：張深切與日治時期啓蒙者的宗教思考	151
第一節	從西方到東亞：五四啓蒙與日治時期啓蒙的理性宗教觀	152
第二節	日治時期台灣民俗社會的宗教生活、各種宗教信仰及宗教改革概況	156
第三節	日治時期台灣啓蒙者反迷信的態度與具宗教信仰的啓蒙者之理性信仰	163

第四節	靈域世界的神秘召喚與張深切的理性宗教觀	170
第五節	結語：張深切思想中宗教與理性的裂隙及其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困境	178
第六章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啟蒙思想與張深切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批判	183
第一節	日治時期舊文人與啟蒙運動的關聯及張深切對文化哲學議題的關切	184
第二節	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啟蒙意識：調和儒學傳統與西方器物之學的明治啟蒙模式	190
第三節	日治時期兩個傳統文社「彰化崇文社」與「台灣文社」的啟蒙思想研究：傳統文人的文明想像與對西方諸國文化歷史、思想人文的引介	192
第四節	1920年代中期以來「孔墨並尊論」與「非儒」言論的興起：魏清德、黃純青、連橫、周定山對儒學的動搖與對西方啟蒙思想及墨學的科學精神、功利主義、博愛思想與世界主義的傾斜	200
第五節	張深切的文化民族主義：對儒學主觀唯心傳統的批判與對中國古代知識學派的崇尚	210
第六節	結語：日治時期舊文人及張深切的新文化觀所建立的台灣觀點	217
第七章	新文化主體雛型的建立：烏托邦的想像——回看日治時期啟蒙者與張深切對人類理性精神的樂觀主義	221
第一節	日治時期啟蒙思想的現代性：具務實、靈活性與烏托邦理想的新的「文化主體」雛型	221
第二節	張深切啟蒙思想在日治時期啟蒙運動的指標性意義	223
第三節	啟蒙理性的守衛者：從後殖民、後現代的流行，回看張深切思想的現代性意義	227
	參考書目	231

緒論 日治時期台灣的啓蒙運動與張 深切啓蒙思想的指標性意義： 被殖民啓蒙、現代性與歷史書寫

本論文以啓蒙的觀點〔註1〕，重新檢視台灣自 1910 年代晚期至 1930 年代中期全島性的新文化／社會政治運動，探討其做爲「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層面的內容，實則蘊含一種藉由回顧歷史、尋找台灣在現代全球化時代文化主體性建構的起源與文化位置所在的意義。日治時期，在日本殖民政策的規劃與建設下，台灣漢民族社會，經歷了由前現代／傳統閩粵封建／農業社會，進入被殖民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鉅變。日治時期台灣新舊知識份子，在這社會的鉅變中，首當其衝地感受到舊式文化道德價值觀的失勢與無力。他們主要經由殖民母國與文化祖國的啓蒙運動經驗，接觸了十七世紀以降的各種西方啓蒙相關思潮，在意識到西潮不可擋與西方文化優勢的認知下，爲

〔註 1〕 西方的啓蒙運動指的是，十七世紀以來以批判王權、神權、與特權做爲開端、在歐洲地理上由西向東傳播的一個廣泛的文化哲學社會思潮與運動，所發展出來的龐大哲學體系，與對中世紀的「除魅」(disenchantment)、主體自由、理性思維、科學唯物論、自由人權、文明進化論等思想，密切相關，歷經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哲學家的持續思考，發展出龐大的、內部差異甚大的思想體系。進入 20 世紀世紀初期，Horkheimer 與 Adorno 指出啓蒙理性所蘊含的野蠻與自我毀滅性，啓蒙與反啓蒙的爭論，開始普遍熱烈展開。工具理性與實證科學，如何窄化人類的文明想像？而啓蒙理性思想的共相，到底是歐洲中心的觀念、是壓抑多元與差異的工具，還是，啓蒙理性的除魅仍是未竟之功？這些至今仍是爭辯不休的議題。在此，本文所指的啓蒙思想，採廣義的定義，泛指日治時期台灣透過被殖民統治的經驗、日本明治啓蒙與中國五四啓蒙所接收、翻轉的所有西方啓蒙思想傳統。

了在當代文化政經氛圍裡、保存台灣島民的特殊主體位置、使不致遭到日本殖民者同化滅族的命運，主動連結全島地主士紳知識階層與後來加入的農工階層的力量，蔚為一波波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企圖建立台灣島民的主體意識與新文化觀，以對抗台灣總督府的殖民歧視同化政策。當時，與西方啓蒙思想傳統相關的理性思維、科學實證、自由主義、功利主義、民主代議政治、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宗教改革觀、人權思想、平等博愛觀等等思想，經由日本明治啓蒙與五四啓蒙經驗的翻譯轉用，似滾滾洪流，滔滔湧入台灣島上，衝擊所有日治時期台灣的有識之士，台灣自此成為有意識的國際社會一員，在西方啓蒙傳統各流派思想間本來具有的相容性或矛盾性、東西文化的異質性、與特殊的被殖民壓迫經驗之間，摸索建立起適合改造台灣舊社會的啓蒙思想，已然具有建構文化主體的能動力。

然而，現代性的建立，無論是在歐美各國或各個次殖民地與被殖民地，狀況均有差異，所建構出來的現代性也各有特徵，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與其翻譯挪用西方啓蒙思想所建立的啓蒙思想，也自然有其獨特的現代性特徵。它是在被殖民的特殊歷史情境下，透過與中、日、台三方的文化政治的交流與對話，所探索出來的現代性，具有其不同於明治啓蒙與五四啓蒙所建立的特殊性。而日治時期台灣啓蒙思想所呈現的特殊現代性，正是本論文關注的核心焦點：日治時期的文化啓蒙思想，具體內容與所呈現的現代性為何？此文化啓蒙運動，與社會政治運動的關係又如何？在這啓蒙運動中，西方啓蒙思想傳統中的哪些思潮派別，究竟經過怎樣的引介、翻譯與改造，形成日治時期台灣啓蒙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徵？日本殖民統治、明治啓蒙與五四啓蒙，在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中，如何協助或影響啓蒙者翻譯西方的啓蒙思想？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文化、社會、政治因素的交纏糾葛，又如何影響日治時期的啓蒙運動？日治時期台灣啓蒙者，如何彌合啓蒙理性與自由平等博愛觀的普遍性，以及民族主義所講求的特殊性之間的根本矛盾差異？日治時期啓蒙者，如何取捨與彌合中國唯心道德文化傳統與西方科學理性傳統間的異質性與根本矛盾，以建立新的文化主體？啓蒙右派與啓蒙左派思想主張，各自的具體內容為何？日治時期的理性宗教觀，在這啓蒙運動中，具體情形與內容為何，又如何處理理性獨立思考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本論文所試圖涵蓋解答的。筆者將以 1930 年代「台灣文藝聯盟」領導人之一的張深切為分析的軸心，以張深切啓蒙思想的各個面向做為據點，深入日治時期啓蒙運動錯綜複雜的歷史語境與脈絡之中，逐一

地分析釐清張深切與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種種面向，爲上述的問題找出解答。

本論文之所以選擇以張深切做爲研究日治時期啓蒙思想軸心的原因是，在日治時期啓蒙者普遍以啓蒙運動做爲社會政治運動的先導、相對忽視深耕文化議題的氛圍裡，張深切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最徹底堅守文化啓蒙者角色、也最足以呈現日治時期啓蒙思想所有面向的啓蒙者。他試圖思考歸納當代左右派所有的思想面向，跨越東西文化的藩籬，找到融通所有事物道理的普遍原則，其綜合、化約、簡化、理性的思考方式，屬於現代主義模式，也是以人「類」爲單位的啓蒙基本思想模式〔註2〕，可說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深刻、最具企圖心的文化啓蒙者之一。透過分析他啓蒙思想的各個面向，我們可以大致掌握日治時期啓蒙思想的基本特徵，以及此啓蒙運動所建構出來的現代性及文化主體。本研究的焦點，將既環繞在張深切啓蒙思想的五個面向，著重分析他的思想特色，也將廣泛的觸及整個日治時期啓蒙者所共同營造的啓蒙思想內容特徵。而在進入論文本體章節之前，筆者希望先提出幾個有關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的基本特徵與問題點，其中也包括本論文的方法論、基本批評論點、研究資料、企圖心與限制等等。

第一節 分裂與統合：1910年代晚期至1930年代中期 台灣啓蒙運動的多向碎裂性 vs. 同質共相性

我們談明治啓蒙，談五四啓蒙。發生在日本十九世紀晚期與中國二十世紀初期的這兩個新文化運動，常被視爲整體的、有被意識地推動的、雖然仍存內部差異的啓蒙運動〔註3〕。但在研究1910年晚期以來由台灣新舊知識份子結社所發動的一波波新文化與社會政治運動時，雖然必然涉及啓蒙運動對文化與文學的改造與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議題，卻鮮少有學者以較有複雜脈絡的文化啓蒙運動的觀點切入，對這整個啓蒙歷程做整體全面的思考、或具

〔註2〕 根據康德與黑格爾對理性的見解，理性是一種不具民族、膚色、性別與階級特殊性的人類共性，是屬於全人類的共相，也就是以人做爲「類別」的共通準則。

〔註3〕 以明治啓蒙與五四啓蒙爲主題的研究，非常之多，如舒衡哲、王青、周策縱、金耀基等學者，有以五四啓蒙爲主題的研究；土方和雄、李永熾等學者，以「明治啓蒙」之名，將「明六社」的福澤諭吉等六人，視爲爲明治啓蒙的研究核心。

體地在歷史脈絡裡挖掘這啓蒙運動所建構出的新文化哲學觀點。學者多以個別作家、各個左右派雜誌報刊、各個傳統與新式文人的文藝結社、白話文運動、鄉土文學論戰、舊文人的文化觀、左派社會革命運動、電影、新劇等，以其抵抗及啓蒙精神，做爲研究題材，著重其個別、碎裂而多向的文化、社會、政治運動面向；或以後殖民的理論，重新審視被殖民地現代性的文化接納、轉化與抗拒問題，以求徹底擺脫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被殖民狀態。採取這種研究取材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因爲自 1910 年代晚期到 1930 年代中期所發生在台灣文化領導階層的事，本身便是破碎、多向、隱匿、多義的運動：隱匿的政治目的、重疊曖昧的身份認同觀、文化啓蒙與社會政治運動的重疊、南轅北轍的社會政治運動路線、對文化哲學議題相對的忽視、新舊文學難以被並陳研究等等因素，使得這一波波的運動，很難用「啓蒙運動」一詞概述之。事實上，日治時期文化啓蒙、社會、政治運動的交錯瓜葛，使得學者難以單獨從文化啓蒙的面向，說明清楚這段歷史。加上參與這段歷史的新舊文人的思想，也在歷史與文化因素的複雜性中，顯得似乎新舊重疊、認同混雜、結構含糊、思想多變，而令人在未能深入做整體綜合研究的情況下，有無所適從之感。

但是，這種破碎、多義與多向的運動現象，並不意味著，發生在 1910 年代晚期到 1930 年代中期台灣文化領導階層的事，不是文化啓蒙運動，或無法以文化啓蒙運動的觀點切入，來整體地加以討論。誠然，那是個一波波文化／社會／政治運動不分、派系分裂嚴重、碎裂而難以整合的運動的總合；然而，在這段歷史期間，台灣全島新舊文人，運用結社與機關雜誌，發揮結盟團結的力量，不遺餘力地引進西方啓蒙思想傳統裡的各個思考面向與社會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民主代議政治、現代民主主義、理性主義、科學實證、社會主義、理性宗教觀、平等博愛觀、階級觀、歷史唯物論、唯物辯證等等——，並重新思考中國古代哲學的現代意義，對西方啓蒙思想傳統、明治與五四啓蒙經驗，加以翻譯、批判、取捨、融合等等，卻明白顯示一種翻譯挪用西方啓蒙思想改造台灣封建傳統社會與文化，使台灣成爲現代化社會的意圖。而儘管知識份子新舊思想交錯、認同意識重疊、左右派啓蒙者對民主代議政治與社會革命的主張南轅北轍，但他們卻都強烈知覺文化啓蒙的重要性，主張以啓蒙運動做爲社會政治的先導。也因此，穿越表象的破碎多向與多義的背後，這段歷史期間一波波的運動，並非真正無方向、個別、

碎裂的，而是指向爭取台灣島民生存空間、建立新文化道德與社會政治主體性的共同目標的。因此，它可被視為整體的、有方向性、並在差異中存有同質與共相的啓蒙運動，來整個加以思考研究。雖則這樣的研究切入點，與現代性所著重的多元、特殊與眾聲喧嘩並置似有矛盾衝突，但筆者認為，探究日治時期啓蒙運動的整體與全面的面貌，是避免走入歷史迷霧，釐清日治時期現代性各個面向必要的工作。事實上，深入研究之後，可以發現，日治時期的文化啓蒙運動，不只是工具性的做為社會與政治運動的先導宣傳，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也是台灣本土文化試圖與世界文化接軌的全面性初步嘗試。而至於這啓蒙運動，最後是往中國或往日本方向推進的，並非最大的重點。毋寧說，這啓蒙運動所建立出來的，是以台灣本位做為思考基礎的新的文化主體雛型。

筆者以為，全面挖掘、綜合出日治時期啓蒙運動所建構的啓蒙思想的各個面向與特徵，更能幫助重新思考日治時期個別作家作品、文藝結社、社會政治運動的現代性意義，而賦予新的詮釋，也可藉由突顯日治時期這些從事文化啓蒙運動的新舊左右派知識份子的思想面貌與其現代性意義，找到台灣新文化與世界思潮接軌的源起處。

第二節 被殖民情境下的啓蒙現代性：「歐洲中心」 文化模式，還是「文化主體」的建構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次殖民地與被殖民地的啓蒙運動，是由西方帝國主義帶來的西方啓蒙思想傳統為範本的新文化運動。對這些非西方世界的啓蒙者而言，現代化指的是：西方哲學與科學體系的建立、西式教育與大學、現代都市的誕生、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鐵路電燈電報等現代科技的發展……等等，是個無庸置疑的西化。而現代性則呈現在，黑格爾所說的「主體性的自由」(freedom of subjectivity)，是種主張理性思維、自我創造性、自由獨立思想、創新與改變，斷裂於傳統及迷信的新的思想模式，含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性。以哈伯瑪斯的說法來解釋，「在現代性裏，無論是宗教生活、國家、社會以及科學、道德與藝術，都被轉化為此主體性原則的諸多具體形式」(“In modernity,……religious life, state and art are transformed into just so many embodi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subjectivity.”)〔註4〕。現代性或被認為斷裂於啓蒙理性（傅科），或被認為是啓蒙理性的延續（哈伯瑪斯），但無論被解釋為其中的某個概念，均為歐洲文化哲學傳統裡自然孕育生產的子嗣。而屬於不同文化體系的非西方國家啓蒙者，往往依據現代性創新與自我創造的概念，切斷與本土文化思想傳統的聯繫，將西方文化哲學橫向移植到朝著現代化轉變的本土社會文化裡。東亞的明治啓蒙、五四啓蒙與日治時期台灣啓蒙，便都是同樣採取「橫向移植」的啓蒙模式，以西方文化哲學，做為文化改造的範例。

但這種「橫向移植」西方文化的做法，究竟會致使啓蒙運動停留在「歐洲中心」的思維模式，還是終究能經過文化的翻譯和轉化，達致「建構文化主體性」的目標？從這種「橫向移植」啓蒙模式，在明治與五四啓蒙運動中，分別遭到日本國粹派與中國國粹派與新儒家的強烈反彈、五四啓蒙運動的大將甚至被譏為媚外的「買辦文人」的種種事實可知，除了質疑西方啓蒙理性哲學傳統本身的普遍性之外，民族情緒的介入，也是人們對「橫向移植」西方文化的啓蒙運動，抱持著極大不安的懷疑態度的重要原因。然而，理性與現代性概念，雖是歐洲文化的產物，但它們與宋明理學的悟性、心性概念一樣，並不專屬於某個個人、族裔、民族與國家，而都同樣訴諸人「類」的共相，具有先驗的形上色彩；理性與「主體性自由」的普遍性，事實上，應是超越地域、種族、國家的普遍法則。明治啓蒙者以調和主義，保存儒家的道德修身原則與神道教的天皇崇拜，加上西方啓蒙理性與自由平等博愛觀、現代主義的文明進步觀、科學實證觀，特別著重建設科學、君主立憲與實業，建構起以整體人類文明進化為思考角度的新文化主體性與現代性，使日本能於日俄戰爭之後，迅速擠身於強國之列。而五四左右派啓蒙者，則大多採取與儒家傳統斷裂的方式，欲完全依附在啓蒙理性與現代性的自我創造性之上，建構新的文化主體，卻反而因為完全脫離本土社會的實際狀況，而難以完成任務。另一方面，新儒學雖然另外從柏格森的直覺哲學、康德的道德形上學等西方哲學思想，詮釋儒學與佛學的現代意義，並欲藉此建立新的中國文化主體，但基本上，它並未嘗試調和儒佛學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及科技文明的異質，以協助中國社會完成現代化。如此，由明治啓蒙與五四啓蒙的案例觀察，啓蒙運動對西方文化「橫的移植」，或者成功，或者失敗，原因是否

〔註4〕見 Habermas, Jürge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頁 18。

繫於政治的安定因素、民族性、啓蒙運動能否調和在地的文化特殊性等等，雖然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至少可以得知，藉由對西方文化進行「橫的移植」，而建構出新的「文化主體」，是可能發生的。

而日治時期台灣的啓蒙運動，是否從模仿西方啓蒙思想出發，而在中、日、西方文化異質性的交織與衝突中、在被殖民受壓迫的特殊現代化情境下，建構出來新的「文化主體性」與現代性，或至少建構出它們具體而微的雛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它的內容與形貌為何？這也是筆者透過這個研究，所亟於解答的問題。

第三節 在後現代文化思潮裡，對日治時期台灣啓蒙運動理性精神的省思

根據康德與黑格爾對理性的見解，理性是一種不具民族、膚色、性別與階級特殊性的人類共性。而在英美自由主義的傳統裡，所有人類所享有的天賦人權與自由，同樣也是不因民族、膚色、性別與階級等的特殊性，而有所差別。然而，啓蒙理性所主張的普遍性，注重共相，輕忽現實世界的各種種族、性別、階級、文化與信仰差異，在與現實政治與社會問題碰撞時，每每顯出其脆弱與侷限性。在現實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現實權力運作中，啓蒙理性因為強調一致性與共相，容易成為壓抑族裔、性別、階級、心理、經濟因素差異的工具，也往往被國族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用來做為排斥異己與征戰的藉口。早在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與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啓蒙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啓蒙理性的普遍性要求，已被其解釋為納粹「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清除境內異己元素的原因，蘊含著自我毀滅的野蠻性。而從西方啓蒙思想一開始隨著歐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擴張到全球、強力動搖被殖民地本土文化之際，對被殖民地的領導知識精英而言，西方啓蒙思想即與西方物質文明、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侵略，錯綜複雜地被糾纏在一起，代表著令他們愛恨交織的優勢外來文化，而被視為「歐洲中心」的文化哲學思想。一直到這幾年間，美國布希總統猶以自由解放之名，妖魔化回教異文化，簡化阿拉伯國家與美國、以色列之間數十年來的衝突因素，發動波斯灣戰爭與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以遂其經濟政治利益等作為，便遭到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7~

2003) 強烈的批評質疑〔註5〕。而二十世紀哲學轉向語言學(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研究,導致主體的絕對自由觀念受到強烈動搖,主體成爲語言所建構的、流動、多義而無本質的存在,主客體與「自我」/「他者」及「理性」/非理性的二分概念被打破,也因此,理性普遍性所蘊含的先驗與形上色彩,更進一步受到強烈的質疑。而對啓蒙理性與自由民主價值觀普遍性的質疑聲浪,尤其在女性主義、後殖民理論紛紛出籠之後,變得更形強烈。研究民族、性別、階級的特殊性與被殖民者所受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殖民,取代了大多學者對啓蒙理性普遍性的關注,成爲後殖民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焦點。薩伊德從論述與知識體系、思維方式與價值觀,解析被殖民者內心的不自由與文化的被殖民。法農(Thomas J. Fannon 1885~2001)也呼籲,後殖民時的國家,擺脫先前殖民母國的控制,不要再以歐洲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而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也在其受解構主義與傅科權力理論影響的後殖民理論中,加入被壓迫階級與性別的議題。一時之間,西方啓蒙理性的普遍性,似乎已變成失去其光彩風華的過氣風尚。

而除了後殖民與女性主義以外,啓蒙理性的普遍性,也遭受後現代主義者的批判質疑。相反於現代主義將複雜現象化約、簡單、集中在普遍原則之上,後現代主義者強調異質性,反對任何大系統;對理性、普遍真理與規律,抱持懷疑的態度;也強烈質疑文明進步與進化的歷史觀。如傅科(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何謂啓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指出啓蒙實爲一套包括了社會轉型的政治、經濟、社會、機制的文化事件,而其所包括的人道主義的主題與義涵太多樣與多義,而無法做爲思考的核心〔註6〕,因而主張應超越「贊成」或「反對」啓蒙的立場。而他的歷史觀察則以權力運作在歷史書寫所扮演的角色,做爲思考核心,解構了「大敘述」的普遍性。里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主張現代主義已產生現代精神疾病(modern neurosis),必須由後現代思想治療。他在〈給普遍歷史的一封信〉中,也質疑人類是否應該繼續由普遍歷史的角度,了解社會和非社會現象的複雜狀況,甚至認爲「我們」就是一種文法暴力的形式。而對布

〔註5〕 薩伊德對布希總統的批判,見巴薩米安對他的訪談《文化與抵抗》一書中。 Said, E.W. & David Barsamian. *Culture and Resistance*. 《文化與抵抗》梁永安譯。台北市新店市:立緒文化,2004。

〔註6〕 見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32~50.